



重庆陶研文史

Chongqing Historical Research on Xingzhi Tao

2002 · 2 (总第六期)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

王汉东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

CHONGQING TAOYAN WENSHI

學
習
陶
行
知
教
育
思
想
促
進
教
育
改
革

江澤民

目 录

二〇〇二年第二期(总第六期)

主 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
顾 问:徐仲林 张再为 贾培基
 胡北淇 赵义熙 文履平
主 编:李 亮
副主编:邝忠炽
责 编:许明学
编 委:李 亮 邝忠炽 李 任
 唐祖蓉 李一林 李仕海
 殷学绮 杜东平 许明学
 徐宗梁 张先绪

准印证:

渝内字(01)-(062)号

出版单位:

《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地 址:

重庆市谢家湾正街92号

重庆市育才中学内

电 话:023-68662984

传 真:023-68822468

邮 编:400050

印 刷:

重庆江津市天天印务

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23)47830290

出版日期:2002年6月

中外人士论陶行知(续四)(1)

● 学术研讨

陶行知重庆教育活动的分年研究 唐智松(3)

日本生活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日]中野光(9)

陶行知德育思想研究论纲 尤敬党 张凤鸣(11)

● 陶师与学友

一个意外的新发现 胡晓风(18)

斋藤秋男先生与中国 金林祥(20)

艾青来到凤凰山 高 嘉(22)

忆力扬先生 文履平(24)

劳山的光荣儿子——黄晓庄 陈复君(29)

育才,我生命的摇篮 石 婴(32)

陶行知教育着我们

——一个育才学校学生的日记(连载之五) 郭以实(34)

● 名校巡礼

师陶圣地 育才摇篮

——访重庆市育才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李亮 何 敏(37)

为孩子的梦想而创新 廖文胜(39)

● 学校历程

重庆社会大学前身——社会大学 周西平(44)

一所别开生面的学校——访重庆行知技工学校 唐祖蓉(46)

● 教师论坛

加强校本培训 提高教师素质 杜东平(49)

用“生活教育”理论探索“启发讨论式”教学 武 渝(50)

课堂教学演示实验对中等生的诱导作用 杨路珍(53)

● 特色学校

重庆市清华中学 封二

重庆市巴蜀小学 封三

重庆八中 封四

中外人士论陶行知

(续四)

日·斋藤秋男：“我非常推崇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鲁迅先生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比鲁迅晚生10年的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儿童才能，开发儿童智力。他推行‘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他不愧为‘救救孩子’的勇敢的实践者。陶先生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陶先生的目标是远大的，境界是崇高的。他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

(《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8-39页)

美·毕莱士：“陶先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希望中国儿童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才干的国际主义者。他不仅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人人都享受民主的生活，也希望朝鲜、日本、美国、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他的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运动得有开展。他更使不论哪个阶级，不论哪个种族的人民，都能看、能写，并且能过民主的生活。我曾去过重庆参观过育才学校，我相信他的教育必然将成为中国明日之教育。”

(原载1946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

美·艾德敷：“陶先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广义的民主主义者，他不仅是使一切人民平

等，更进而要使一切生活都民主。第二，他勇敢并且负责任。第三，他能够创造。他的精神永生不亡，因为他已活在了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心中。人的呼吸可以停止，但精神生命还是继续存在的。”

(原载1946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陶先生是一个真善美三者具备的‘完人’。由于他能克服占有欲，扩大创造欲。天下有一种人，只图扩大其占有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这种人只想把一切‘据为己有’。反之，另一种人的创造欲强大，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且更创造于人，愈多愈好，使天下人都能公平享受。陶先生即属后者。陶先生的创造方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虽是教育家，但仍以小学生自居，向社会，向自然乃至向儿童学习。他的创造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升官发财。中国要能少些官僚，少些买办，少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中国也就可以和平民主了。外国要能少些独占资本家、战争贩子，世界也就太平了。希望追悼陶先生的人都能研读陶先生所著的《创造宣言》等论文。

(原载1946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

翦伯赞：我不同意把陶先生比作孔子，陶先生稟然有儒家风度，但陶先生却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做统治阶级的奴仆。陶先生是为人

民服务,他是人民的先生。我也不同意把陶先生和墨子混为一谈。墨子是泛爱的,泛爱就是人人都爱,不管他是好人或是坏人。而陶先生爱人也憎人,爱憎得很明显,所以陶先生不但教人爱人,同时也教人憎人。我也不同意以宗教家来比拟陶先生,陶先生就教于教会学校,他的思想、做人,具有宗教家博爱的精神,但是,陶先生却不叫人民忍受、等待。相反地,他要人民反抗,站起来。那么正确地来衡量陶先生的尺度是什么呢?他有儒家的风度,墨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精神,法家的严肃。他是自古以来哲人的合体。”

(在晓庄公葬陶行知典礼上的讲话。原载 1946 年 12 月 4 日《新华日报》)

罗隆基：“陶先生和孔夫子有本质上的不同。孔夫子教育，一切是往后看的，目的在于恢复周朝的天下。所以他的教育是统治者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做官的教育。而陶先生的教育，一切是向前走的，讲求真理，完完全全是人民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做人的教育。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今天就是孔子与陶先生教育斗争的时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倒孔夫子教育，把那些虚伪的礼义廉耻铲除。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今天我们不要哭。陶先生总是要死的，但陶先生真的就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就是医治中国的特效药。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在陶行知公葬典礼上的讲话，原载 1946 年 12 月 4 日《新华日报》)

董必武：“吾敬陶夫子，
当今一圣人。
方圆巾规矩，
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
山颓道未伸。
此生安仰止，

无复可归仁。”

(在陶行知公葬典礼会场上挂着董老哭陶先生的诗。原载 1946 年 12 月 6 日《新华日报》)

张竞成(草街子当地三十几岁的农民)说出陶校长识字运动给他们的好处，并举出他附近的例子：“十多年前个字不识的人，而今都能写点简单的文儿了。原先工农不能读书，现在能读书了，谁人还不说好咧？我们晓得谁是好人，谁是歹人。”

(古圣寺陶先生追悼大会上的发言。原载 1946 年 8 月 20 日《新华日报》)

刘寿朋（1946 年时担任重庆市行辕秘书长，重庆市陶行知追悼大会主席团主席）：“从今天参加大会人数的踊跃（陪都各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到会的各民主文化教育团体机关代表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可以看到陶先生的伟大，因为陶先生是一个为社会教育始终奋斗不懈的人。陶先生的死，无疑是国家民族和教育界的损失，希望大家担负起陶先生未竟的事业，则他的精神永存。”

(原载 1946 年 9 月 23 日《新华日报》)

许德珩：“陶先生无论从事业及年龄上说，是不应该死的。但他毕竟是死了。贪官污吏汉奸都不死，偏偏他死了，谁使他死的？是中国的社会！在‘九·一八’的时候，陶先生就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抗战后他又为民主奋斗终日奔走。他是反对帝国主义最激烈的，他希望国内和平与安定。”

(原载 1946 年 9 月 23 日《新华日报》重庆市陶先生追悼大会上的发言)

陈嘉庚：“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

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妄，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国济三强。”

(赵义熙辑录)

● 学术研讨

陶行知重庆教育活动的分年研究

唐智松

引言 陶行知(1891-1946)教育生命的最后8年,即生命的最后八年(1939-1946)战斗在重庆:陶行知首次来重庆是1938年“十月初,经桂林、武汉来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陶行知的重庆教育活动始于1939年3月“由重庆到北碚,继续筹组晓庄研究院并着手筹办育才学校”。直到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才离开重庆到上海。7月25日,因为脑溢血而离开人世。在重庆期间,是陶行知先生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分年研究之视角,剖析陶先生居渝期间教育的实践活动、思想发展,为本文旨意所在。

一、1939年:面向抗战、创办育才

陶行知到重庆后,发表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总结过去十二年做的三件事: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和方法;其内容包含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四个运动。基于此,在《我的民众教育观》中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争取全面胜利。为此,陶先生撰写了《生活教育的目前任务》,提出“教育只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把教育的力量输送到前方和沦陷区里面去”。

育才学校是陶先生一生中创办时间最长、

教育思想反映集中而又成熟的学校。早在1938年陶行知回国前夕时,他在香港就发表了“回国三愿”:选拔儿童以作教育实验、创办补习学校以教育救国、创办晓庄学院以发扬晓庄精神。育才学校就是这三大愿望之一的体现。一到北碚,陶行知就物色教师、选择校址,通过智力测验、文化考查、表演实践三方面的综合考查来选拔难童。历以四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1939年7月20日,培养人才幼苗的试验学校——育才学校诞生了。

在育才学校,陶行知主张采取集体教育、分组教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自觉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御敌的小战士;按照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措施,在集体生活教育同时,按学生特殊才能给以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而且相当灵活,“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设普通组以教育之。必要时可以转组。”

育才学校的教育理论体现在当年公布的《教育纲要草案》、《公约草案》、《我们的校徽》等文件中,其中《教育纲要草案》具有代表性,是认识陶行知晚年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文件。该文

中指出,教育性质在于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教育在使儿童获得人格完备发展,达到知、情、意、智、仁、勇之和谐;育才学校实行集体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重视儿童自我教育、反对体罚;坚持学生为中心的师生观,重视儿童的主体作用;教学过程有三种形式(即以工作或问题为中心的教学、以事物之历史发展为中心的教学、各学科系统的学习与研究的教学);教学中重视儿童对语言、文字、图画、数学、逻辑学等文化工具的学习。《教育纲要草案》等文章涉及到了教育性质、人才规格、教育制度、师生关系、教学过程等诸多问题,构成一个相对比较严密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标志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的成熟。

二、1940年:追求民主、接受马列

该年初,陶行知在《谈生活教育》中说,“教育是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此时,陶先生教育改造之目的更加明确,他自觉地站在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上。是年冬,陶行知在“全国经济资源委员会”上说:“有人说我陶行知步步下降,我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级使用当小学校长。但我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而且很愉快。”他还鼓励身边的同志去解放区工作,在一次与戴伯韬的夜谈中说:“对!到敌后游击区去,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我们的力量。生活教育者应该到群众最多的地方去,站在斗争的前线去。何况,光明是在那里,我们要把希望放在那里去。”又说,“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不思索地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陶行知倾向革命、倾向民主、倾向人民大众的思想政治态度表现得非常明确。

育才学校曾集结过党内外精英。“就历年人事看,各部门和各组的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如

校务主任方与严、研究主任程今吾,历届教导主任等都是共产党员”;“来育才学校讲学的陆定一、李维汉、郭沫若等大多是共产党员”。陶行知也“经常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去,有时他去了回来,把几个党员负责人找去,传达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谈话,陶行知已经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

此期,陶行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这在后来1943年的《创造年献诗》中表露明显:“存在由来定意识”、“行以求知知更行”、“屡试屡验还试”;“矛盾相克复相生”、“数量满盈能变质”、“解剖本体寻条理”、“追踪外缘找联系”、“观察发展觅定律”。此包含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倾向,表明陶行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接受。

三、1941年:自救办学、总结教改

抗战期间,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办学经费日益紧张。1941年春,《战时教育》因经费缺乏停刊;是年初夏,“草街子米价涨到每老斗五十三元,比(育才)开办的时候涨了二十五倍”。面对学校存款用完、借谷吃尽、借款花光情况,陶行知就1940年副校长马侣贤来信告学校经费紧张的回答中提出,“解决之法,一为开源,二为节流,三为努力生产。开源我担任,节流您主持。生产要全校动员来干,务使地尽其利,人尽其才。”

为了节流,育才学校实行节约口粮,每日二餐的“集体新武训运动”。陶行知鼓励大家道:从前武训以乞丐而创办三所学校,我们连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岂不愧死!我们要跟武训学,作一个集体新武训。陶行知身体力行,把自己做参政员的每月360元车马费交育才学校。这年,国民党政府威逼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的育才学校交一大笔基金立案。对此,一方面,陶行知领导育才师生抵制立案,另一方面,陶行知提出学校“创造年”计划,要求全校师生动手动脑、手脑

双挥、创建露天舞台、深湾游泳池,改善学校环境。以解决面临的办学困难。

育才学校的教育实验改革在困难中继续前进。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岁的前夜》中把育才学校的教育实验总结为五条:民主集中制的集体自治;包含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的集体探讨;形成健康堡垒、艺术环境、生产园地、文化气候的集体创造的目的;把国文、数学、外国文、科学方法等文化的钥匙交给学生;因材施教、各得其所的特殊学习。

1941年,陶行知还建立了“幼年研究生”班,提出在各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十三、四岁的少年开始搞专题研究;同年又提出音乐、戏剧等六个组按不同需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成立见习团,向社会调查、实习,最后以见习的成绩向全校师生及社会汇报。此为陶行知在超常儿童教育方面的一大创举。

四、1942年:提炼“十诀”、完善理论

育才在前进,陶先生思想在发展。此期,陶行知发表了《育才十字诀》、《育才三周年告同志文》、《每天四问》、《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以及后来的《育才三方针》等文,深化微观教育领域探索。

在《育才十字诀》中,陶先生指出,“育才十字诀”是:一个大脑——脑为基础、力量源泉;二只壮手——手执行脑的命令,运用双手创造;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体验、看书、求师、访友、思考;六组学习;七(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什么事?什么人?什么原故?什么方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数目?什么动向?八贤是顾问;九九难关——坚持追求真理、战胜困难;十(誓)必克服——有战斗到底之意志,就能克服大难、以至于成。其内容涵盖了立志修身、求知思考、思维方法、交往合作等诸多方面。

在《育才三周年告同志文》中,陶行知描写了育才在困难中斗争、在斗争中进步;对师生讲《每天四问》:身体有没有进步——因为健康第一;学问有没有进步——学问是前进的活力源泉;工作有没有进步——做事敏捷,要有毅力;道德有没有进步——建筑人格长城、由公德私德统一形成高贵品质。其中还谈到研究“五字诀”：“一”即专一、“集”即搜集、“钻”即钻研、“剖”即剖析、“韧”即坚持。1944年,陶行知提出了《育才三方针》:迷——根据孩子天性、特殊设环境、引导学生踏入求知之门;悟——根据孩子智力、通过启发、使学生获得广泛知识;爱——根据孩子倾向、通过集体、培养民族人类之爱。

在这些文章、讲话中,陶行知以数字化的艺术、简炼生动的语言表述了育才学校的教育教学思想。这年,他在小朋友主办的《植物小世界》科学墙报题词时,表达他的从生物到书本、从实践到原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体到系统、从近处到远处、从用手到用脑、从肉眼到显微镜、从好玩到学习、从不用钱到不得不用钱、从不轻采摘到不得不采摘的教学原则思想。这些原则实际是自然科学教学做的一般原则,反映其教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些著述中,陶行知教育思想完成了对杜威的简单批判、生活教育理论的初创,教育特别是教学思想趋于完善。

五、1943年:推崇创造、谱写校歌

1943年是育才学校的创造年,也是陶行知思想的创造年。陶先生热情高呼:“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他指出,人人都有创造力,只要坚持创造积累,每个人都会有收获。是年夏,陶行知撰写了《创造年献诗》,主张解剖本体寻条理、追踪外缘找联系、观察发展定律等创新学习,要求活用文化钥匙来、开发天地与人类的大秘密,努力创造新天地。

这年秋天,陶行知在写《创造宣言》中指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同时,陶行知还要求教育者用无畏之斧、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辟出一条生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

陶行知的创造精神在实践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当时,育才学校经费困难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陶行知带领育才师生创造性地工作。1943年春,陶行知借接收邓颖超捐赠母亲坟地二十亩之机,发起了“寸土运动”,组织师生开荒种粮,改善了学校生活。

为勉励育才同学们学习上进,陶行知于1943年写了《育才学校校歌》,校歌中要求孩子们虚心学习,以达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之理想;要求学生“找出真理之夜明珠,衔回人间,饰在每一个人的额前,照着人类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走到天明”;“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他教育学生要懂得真即善、善即美,达到真善美合一。激发学生歌颂真善美的祖国、真善美的世界、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创造之情感。

六、1944年:修正方针、实践创造

总结生活教育经验、剖析抗战教育形势,陶行知把教育方针修正为:民生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与时俱进。在《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中,陶行知先讲发扬优良传统,后讲加强几种学问。其中,前者包括,奉头脑作总司令,指挥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作战;求学之道,在明德、亲民,止于人民之幸福;师生工友团结完成人才培植;虚心向一切学习,要学得专、学得博;建立起健康的堡垒,使生活力与创造力都不浪费。后者包括,学校不仅是学问组织,也是战斗组织,学校还是生产组织;

要积极学习科学、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学习民主,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其中,陶行知特别地谈到科学学习问题,他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抗战建国的大业,都要靠科学的力量完成。……应以科学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生。我们必须培养科学的幼苗,撒播科学的种子,使全中国开遍科学之花,丰收科学之果。”

在教育与人(学生)关系中,陶行知受西方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坚持创造适合于儿童的教育。1944年12月,陶行知发表了《创造的儿童教育》、《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该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教育思想。首先,他要求创造平等的师生关系、和谐的教学氛围。他要求承认儿童的人权、了解儿童的能力需要,主张解放和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教育者要加入小孩子的队伍里去,成为孩子当中的一员。其次,他提出对儿童进行六大解放、营造创造教育条件:一是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二是解放儿童的双手,让孩子有动手的机会;三是解放儿童的嘴,因为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四是解放儿童的空间,让他们接触自然、社会,并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五是解放儿童的时间,特别是课程、考试太多,使得儿童无创造倾向;六是解放儿童的眼睛,鼓励儿童多观察。再次,落实创造力的教育培养。对此,陶行知提出了:培养合格之教师父母;提倡儿童卫生、提供充分营养;建立良好的习惯;教育与生活密切联系,因材施教、培养人才幼苗;要大量开发人的创造力。

通过“民主的创造,创造的民主,动员全体的创造力,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益且发挥到最高峰。”反映了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精神。

七、1945年:崇尚民主、民主教育

推崇民主、开展民主教育是陶行知的一大教育理想。早在1944年,陶行知就高歌《民主第一》:民主第一、民主至上、民主万能、民主应该无所不在;老百姓要做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世界的主人。在1945年10月给育才学校的《召开校务会议》信中强调,育才学校的校务会应该是民主之组织。

抗战胜利后,祖国面临重建。此际,陶行知前后发表了《民主》、《民主教育》、《民主教育的普及》、《民主教育提纲》等大量关于民主和民主教育的论文,把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推向高潮。在《民主》中,陶行知指明了民主涵意和民主路线;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民主路线莫过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特别推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认为它们“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在《民主教育》中,陶行知阐述了民主教育内涵:民主教育性质——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为自己幸福而办的教育;民主教育原则——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教育人民肃清法西斯细菌;启发觉悟性;培养创造力,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简笔字拉丁字母双管齐下;充分运用无线电及其它交通工具;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承认贫穷,发现、运用穷办法以办丰富的教育。

在《民主教育之普及》、《实施民主教育提纲》中,陶行知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普及、实施民主教育的问题。他指出:只要知识分子念头一转,肯帮助别人好学,不须花费一个钱,便可以帮助老百姓识字,受到民主教育。坚持普及教育、文化为公、因材施教等原则,采取自动、自

觉、客观、科学、因材施教、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等方法,民主教育是可以很好实现的。并且在教材、课程、学制、行政等方面,陶行知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些关于民主教育的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八、1946年:创办社大、推动民主

1946年,重庆社会大学开学,陶行知任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李公仆副校长谈了“自觉、自治、自训”的教导方针。在《社会大学运动》中,陶行知精彩地剖析了社会大学的意义:社会大学存在有形与无形两种: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人人都是先生、又都是学生;社会大学是一个最伟大、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把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的思想植入人心,是社会大学第一个任务。

在《社会大学颂》中,陶行知热情赞颂: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认为农场、工场、会场、商场、广场、娱乐场,都是课堂:社会大学自由、自勉、自强;号召全国同胞都加入社会大学堂。当然,创办社会大学,普及教育,密切教育与社会联系,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在当时中国现实,陶先生所面临的具体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他的这种教育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重庆谈判”后,独裁政府日趋疯狂,国内战云密布。陶行知为民主建国而奔走呼号,战斗在民主运动的前线。1946年2月,重庆各界为庆祝政协闭幕而举行集会,陶行知动员号召:“政协会议已经幕闭,双十协定也早签了字,但是纸面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1946年,是陶行知民主行动的重要年,此

在许多材料中可见,如在《追思民主大将李公烈钧》中发誓:“一代元勋(指李烈钧,作者注)倒下之时,让我们服膺他的精神,继续努力奋斗吧!”在《怎样可以得到和平》一文结束时高呼:“和平与民主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全国万众一心,拼命争取”。其它如在《谈社会大学》、《小教师与民主运动》、《就“下关事件”等问题和外国记者的谈话》、《走向殖民地》等文中也表达了陶行知的民主理想。

当然,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庆祝政协闭幕的群众集会前,陶行知就预料庆祝会一定会有人捣乱破坏,并说:“我今天去开会准备挨打,甚至流血。”果然,这次集会被破坏,主持会议的李公朴受伤,郭沫若、施复亮等被殴打,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受伤者六十余人。但陶行知并没有被吓倒。这年夏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示威游行大会上,陶行知说:“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要真正的民主!”并积极支持、欢送马叙伦等代表到南京实施民主请愿。在昆明“下关事件”中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斗士被害发生后,7月16日,陶行知写了《给育才师生最后一封信》,他说,“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在同日给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信中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抵抗的大势。只要我们肯得为民主死,真民主就会来到。”由此表达了陶行知先生对民主在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心与果敢行动。

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离开重庆,后到上海。至此,陶行知的重庆教育活动八年结束。不幸的是,7月,由于反动派迫害、刺激过深,加以日夜忙着民主运动、育才迁校、晓庄复校、工学团复核、创办上海社会大学,以及连夜整理诗稿等操劳过度并发脑溢血症而逝世。

结束语:陶行知的八年重庆教育生涯,是其教育生命中辉煌的八年。从提炼“十诀”、“四问”,提出“三方针”、“八顾问”到呼吁“儿童六解放”,提出与实践创造教育理论,育才学校体现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些创造性的工作标志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发展。

从创办育才学校教育实验,开荒种粮,在困难中开展生产自救以办学;创办社会大学,普及社会教育。这些实践性的努力表现陶行知教育实践的深化。

从明晰生活教育目的向抗战教育转变,研究民主,促进国家民主政治,为民主教育而奋斗,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勇士般的行动反映了陶行知思想政治的进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先生一生真实的自我写照。郭沫若在总结先生时说:“陶行知先生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他的‘占有欲克服到零度以下,而创造欲扩展到百度以上’”。胡乔木评价陶行知说:“陶先生又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近代中国教育界涌现出了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宴阳初、梁漱冥等众多大师,但就思想观念的民主性、教育思想的创造性、教育活动的实践性而言,陶行知无疑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被毛泽东称为当之无愧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先生已去,思想尚存。陶行知实验教育——育才学校将继续,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传承。作为一个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重庆八年教育活动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重庆教育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研究。

(作者系西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日本生活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日]中野光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历史回顾

日本生活教育实践开始于30年代,当时也是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期。当时推动生活教育最有力的武器是杂志,《生活学校》就是这样一本杂志。该杂志是1935年由东京迟代(音译)儿童村小学(一所私立学校)发行的。这个学校是20年代在自由主义的教育中产生的。对于进步教师来讲,这所学校就是梁山伯式的学校。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由于财政上出现的困难,这所学校连存在都有危险。但是这所学校的教师还在想方设法使这所学校成为民主主义教育的园地,并得到发展。他们当时为了得到全国进步教师的协助,成立了名为“生活教育研究会”的小组。他们希望在困难的生活中也能进行这样充满爱心的教育,为了鼓励年轻的教师来参与这项事业,他们创办了这份杂志。

1930年的秋天到1931的春天,陶行知先生逃离上海,曾在日本逗留。这是研究陶行知的专家都知道的事情。当时是谁帮助陶行知先生从上海到日本,又是谁资助他在日本逗留及生活,我曾竭尽全力作过调查,但至今都没有结果。我听说国民党政府曾要求日本政府监视到日本的进步人士。对这个事情,斋藤秋男先生以及其他年轻的先生也曾作过调查,但是对其详细情况还是没有搞清楚。但是毫无疑问陶行知先生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一点,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记述中也有反映。1935年《生活学校》出版后,付琢(音译)先生将其寄给了当时在上海担任山海工学团团长的陶行知先生。陶

行知先生收到后,回了一封感谢信,随信寄去的还有他的论文《中国改造论》和一些中国童话书。我们称呼付琢(音译)先生为“日本的陶行知先生”。他现在已经94岁了,身体不太好,但我们还是请他当生活教育的顾问。在他身体还好时,他曾把陶行知先生送给他的书给我看过,上面还有陶行知先生的签名。几乎在同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组建了中国生活教育社,并主办了《生活教育》杂志。这个看上去偶然,但我认为它有它的必然。

日本的生活教育在40年代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当时在日本把生活教育称为生活学校世界。以付琢(音译)先生为首的100多名教师以及《生活学校》的读者由于继续在日本从事生活教育而被逮捕,投到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讲是个痛苦的日子,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胜利的日子,对于从事生活学校世界的教师是个被解放的日子。1946年4月,《生活学校》复刊,也可以说是日本生活教育运动重新开始的一天。日本生活教育联盟作为战前生活教育的继承者,有很多年轻教师加入进来。1948年10月30日,生活教育联盟成立了。我们生活教育联盟历经了54年的磨难终于走到了今天。我们生活教育联盟主办的杂志(《生活教育》)迄今发行已超过600期,具有如此生命力的杂志没有其他。我们前年出版了《日本生活教育50年》,这是一本写生活教育历史的书。根据生活教育联盟的观点,这本书把日本生活教育分为三个阶段。

二、日本生活教育的发展阶段

(一)从1945-1960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通过教育向日本社会的混乱和贫困挑战的时期,简言之,是向贫困作斗争的时期。

贫困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当时有这样的比方:对小孩子来说,生活就是教育。当时的儿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上课,也就是在劳动中接受教育。通过劳动使他们接受了科学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曾在1951年出版过一本书,收集了孩子们的文章,书名叫《当前的学校》。根据这本书还制作了电影,被汪向荣(音译)译为中文。

(二)从1960-1980年是第二个时期,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生活出现的矛盾进行挑战的时期,即同物质丰富带来的问题进行斗争的时期。

进入60年代后,具有劳动意义的教育生活不复存在了。生活已经不能再教育了。孩子们不用再劳动,也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生活好了,但孩子丧失了很多东西。我认为首先他们丧失了通过生活可以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孩子们十分孤独,父母出外工作,孩子们很少能见到父母。其次,孩子们在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丧失了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从前的孩子还能感觉自己在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现在却只剩下学习。我对学习的体会是:如果它是自愿的,它就是快乐的;如果是被强迫的,那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日本有一个学者这样形容60年代的儿童:“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太多,自己努力获得的太少。”此外,孩子们丧失了接触自然的机会。城市的孩子连玩耍的地方都没有了。由于电视的普及,孩子们只会呆在家里看电视。今年日本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野依(音译)发表文章《向自然学习,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强调孩子要在自然环境中学习。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筑波大学教授北景(音译)先生也强调孩子们要在与动物的玩耍中培养对自然的兴趣,两位化学家的看法都是要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70年代,生活教育联盟提出了以下要点:

1. 要尊重人成长中的基础体验,包括野外教育,种蔬菜,养小动物等。

2. 要他们自身直接去感受社会和自然,如“休学旅行”等,而不只是通过媒体来了解生活。

由于日本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公害(水污染、空气污染等)越来越严重,所以,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公害学习”。明年七月,日本中小学将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叫“综合学习”。这门课程的出发点就是“公害学习”和“和平学习”。

3. 知识固然重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感性”(日语直译)。

(三)从1980年至今是第三个时期,是向人内心世界的荒芜挑战,以及为了人类共同生存而进行挑战的时期,即同人的内心贫困作斗争的时期。

1981年,日本黑柳彻子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在其后记中反映了学生和老师内心贫乏的现实。陶行知先生说过,爱连接着天堂,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爱培养出爱。日本目前的教育现实就是尽管学生物质非常富裕,但内心空虚,而老师却只知道向学生灌输知识,通过考试成绩来指导学生。我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人,培养孩子的人性。因此这种教育就不能只传授知识。还要培养他和亲人的联系,和朋友的关系。孩子的心灵不是从外部打开的,而是从内部打开。教师要注意倾听孩子的心声。

日本生活教育联盟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我是少数派,但只要我们努力,就能给下一代以希望。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和陶行知先生的距离拉近了。我希望我成为和你们一样继续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当中的一员。

(中野光,日本著名陶研专家,中央大学教授,日本生活教育联盟副委员长。本文系作者在2001年10月西南师大“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陶行知德育思想研究论纲

尤敬党
张凤鸣

文 摘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探讨了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比较系统地分析并阐述其德育思想的历史渊源、基本内核及现代价值。重点论述他在德育思想体系内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德育目标论、德育价值论、德育结构论、德育整体论和德育实效论。

关键词 陶行知 教育思想 德育思想 德育研究

道德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主题。陶先生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歹就愈大……”为此,他在长期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办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中,以中国传统道德精华为基础,融会近代以来西方德育的成功做法,建构起了极富实践性的德育思想体系,且对与时俱进的现代德育富有深刻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核,以促进和推动德育的现代化进程。

1. 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历史渊源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教育,都有其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袭得性,德育当然亦不例外。陶行知在探索中国“新教育”运动之中,既有从中国本位论演变而出的“文化至上”、“伦理本位”或“以农立国”为依据的教育目的论;也有从

全盘西化演变而来的照搬西方的教育实践活动。然而,在复杂的思想论辩与实践探索之后,陶先生又以自身极富创造性的智慧融中西之长,弃中西之短,艰苦地构筑起一个优秀的教育思想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为后来者奠定了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石。其德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沿袭了这一历程。

翻开中华传统道德的巨册,孔子成为首推之人。从世界道德文化发展的历史去审视,孔子的道德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统一的最典型的范例。孔子的思想曾三度在全世界引起深刻的震动与反响,即所谓世界范围的三次“孔子热”:16、17世纪,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引起了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普遍关注;一次大战后,在帝国主义血腥厮杀面前,西方公众希望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教育中吸取建造和谐人道社会的思想营养;20世纪

七、八十年代,西方公众急于摆脱精神文明日益沦丧的困境,祈望从中国道德教育的历史宝库中寻求启迪。这里清晰地显示出,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向往,也证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所具有的生命力。

然而,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实质是有区别的。西方德育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其出发点是以“个人”为本。哲学家弗兰克纳认为:“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而中国传统道德就提倡“德不孤,必有邻”(孔子语),强调人的社会性。人们不仅熟悉孔子早年提出的“推己及人之道”这个著名的道德修养原则,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对后世《礼记·学记》中所提的“敬业乐群”的道德规范,及《礼记·大学》中所拟的“修、齐、治、平”的进德序列也不会陌生。这些民族德育思想给陶行知以深刻的影响。陶行知则以兼采融合的观点,为寻求现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曙光,上下求索,汇通中西,坚持人的社会化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观,在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陶行知看来,一个人不能实现社会化的发展,必是“一个悲剧”。其德育的出发点立足于人的社会化属性,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精华之传承。陶行知明确提出了“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他认为,实现人的社会化,不仅不与人的个性发展矛盾,而且“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

陶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如此阐述,而且在兴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实践中也极力提倡。他呼吁,学校“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强调要“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他十分注重把人的个性发展与实现社会化的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提倡教育儿童从小养成“文化为公,知识为公”的价值观念。这里

的“公”,即是指社会。其核心是,个人属于社会,个人应当服从社会。决不能把知识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学成之后可以“待价而沽”,站在人民之上。

在陶行知的人才价值取向中,人才品德结构居于首要地位。而他所持的评价标准则是,看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此,他指出:“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万卷书有何益处?”

2. 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基本内核

陶行知德育思想体系庞杂,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十分丰富。但是翻遍《陶行知全集》,却并不能直接找到有关德育的体系性专论。笔者期望在比较全面地研究其有关德育言论的基础上,梳理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核,用以借鉴对今天德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发展。

2.1“做真人”的德育目标论

教育是“教人化人”的事业,其目标就是教人“做人”。“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因此,教育目标的确立是教育思想形成的起点和关键。当然,陶行知德育思想的起点同样也离不开其独特的德育目标论。

陶行知强调:“真理是老师”。先生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做真人”就是陶行知的德育目标。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为此,他给孩子取了“问真”、“探真”的学名。

在陶先生看来,崇尚和追求真理是学生品格的第一要旨。据当年山海工学团的学生张健回忆,陶先生常用柏拉图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鼓励学生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告诫教师和学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求真知识,摒弃伪知识。何谓真知识呢?他认为:“思

想和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而智慧又是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滋生和丰富起来的。

“教人做人”,“做真人”既是陶行知一生搞教育的目标,也是其个人的人生信条。他对学生的教育就是以此作为准绳的。其实,“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过正常的生活,这一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在德育目标上的具体体现。德育当然离不开生活的基础,它是为了让人们生活的更好才显得十分重要。而“做真人”的关键是多了一个“真”字。这个“真”就是指真理、民主、为人民。真人,就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人,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这个观点和今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陶行知“做真人”的德育目标,是面向人生,面向生活,极具实践性的。这一鲜明的德育目标,提醒学校和教师在实施德育时,必须以“真教育”来育“真人”。陶先生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便是骗子。”其实,实现培育“真人”的德育目标,关键是要有“真德育”和“真教师”。

2.2“人中人”的德育价值论

道德的价值标准是德育成败的基础,也是选择德育内容、方法、途径的重要依据。陶行知认为,应当教育学生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或者“人下人”。所谓“人中人”,“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在他看来,“人上人”是那班“做坏事,吃好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人下人”就是受压迫、被剥削而尚未觉悟的劳苦大众。陶行知以为,一个人位卑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位卑而丧志,甘做“人下

人”。

“人中人”既是陶行知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也是其德育思想的价值坐标。有一次,育才学校有一个学生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训来鼓励他的伙伴必须努力学习。陶行知知道后,便把那个学生找到办公室,要他自己思考后予以纠正。那学生感到错了,就改成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陶行知不禁笑着说:“这也不对。在公平合理的社会里,不应该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只有‘人中人’。”1939年,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时,曾有人对他办学的目的产生疑问。他特地郑重发表声明说,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他(学生)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这里已十分清晰地看到,陶行知所倡导的“人中人”的德育价值的全部内涵。

以“人中人”为德育的价值定位,是陶行知“人民第一,一切为了人民”“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思想在办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做人标准的扬弃,又包含着对来自西方民主平等的人道思想的选择性接受。当然,陶行知并不反对学生去“做官”,“做官”与做“人中人”是一致的。他说:“做官并不坏,但只要能够服侍农人、工人就是好的。”显然,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要有做“人中人”的道德价值观,要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2.3“智仁勇”的德育结构论

德育的内容几乎涉及了人生成长发展的方方面面、其规范也有许多。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提出了“智”、“仁”、“勇”为“三达德”;

《管子·牧民》中有“国之四维”的提法，即“礼、义、廉、耻”；孟子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德等等。陶行知在确定德育的内容结构时，直接继承并发展了这些德育成果。他说：“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他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陶行知在德育思想发展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论证了“智仁勇”作为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清晰地阐明了这三德相互为用的理论，从德育内容的结构层次上补充、完善并发展了传统德育思想。他说：“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

“智仁勇”既从最本质的德育内容结构上理清了思路，又兼顾了道德的理性精神、情感发展和实践能力培养诸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德育整体性的独特风貌。它是陶行知整个德育思想体系中的血肉，印证了其“做真人”的德育目标和“人中人”的德育价值。

其实，“智仁勇”无论对孩子还是对成人都十分重要，它是构成完美人格的基本要素。他给孩子们讲“智仁勇”就非常通俗。他在《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中这样说：“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看得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人。……第三，勇敢。勇敢的活才算是美的活。”这三件事实质就是“智仁勇”。做人的大道理都看不懂的，一定不智；遇患难而不帮助人的，一定不仁；不勇敢的，当然不勇。可这样给孩子们讲大家都懂。这里也告诉我们开展德育应坚持因材施教，才能收到实效。要让丰富的德育内容转化为孩子的思想行动还得

很好地寻求方法，设计途径。

2.4“知情意”的德育整体论

德育目标的达成，德育价值的体现，及至德育内容的完成，都取决于对正确方法的选择。陶行知认为，智、情、意三者并重，应在三者统一的教育中使学生的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他的基本论点是，把德育知识的灌输、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顽强意志的发展整合为一。以整体论获取最佳值。

陶行知说：“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这里不仅对知、情、意三者的本质内涵作了科学地阐述，而且较为清晰地分析了这三者之间丰富而紧密的内在联系。

德育过程，是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逐渐内化为道德理念，不断滋生起合理的道德情感。进而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并转化为被社会和他人所赞赏的道德行为。因此，这个过程必须追求“知情意”的完美统一。

实施这一整体论的德育方略，关键应注意几个环节：以多彩的活动丰富学生的道德情感，让道德知识的传授蕴涵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以多样的实践训练学生的道德行为，使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转化渗透于孩子们常的学习与生活之中；以广泛的社会参与理解社会公众道德的评价标准，帮助学生接受社会对人